

“不被敌人定义”

——《芬克勒问题》中“羞愧的犹太人”与身份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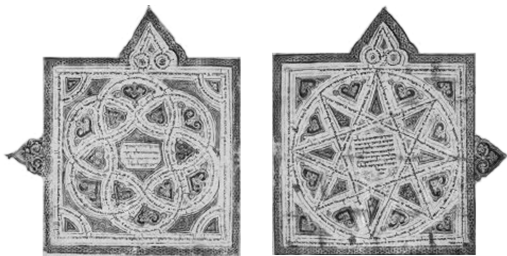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饶雪*

【摘要】英国犹太裔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在小说《芬克勒问题》中呈现了多种犹太问题。本文以小说中的人物芬克勒及“羞愧的犹太人”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社会心理学家对“犹太人的自我憎恨”的研究基础上,探讨小说中巴以冲突语境之下“羞愧的犹太人”组织产生的内在原因。“羞愧的犹太人”内化参照群体对犹太人的偏见,以正义为由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以色列,憎恨自己的犹太身份,但他们的憎恨并不能改变反犹主义者对他们犹太身份的确认。通过层出不穷的反犹事件,雅各布森思考了对以色列的恨是否会导致对犹太人的恨这一问题,揭示了非犹太人对犹太人难以改变的偏见。通过芬克勒身份的转变,雅各布森批判了“羞愧的犹太人”具有反犹主义性质的行为,展现了流散犹太人构建文化身份的困境,表达了他对犹太人未来的担忧以及对犹太身份的坚守。

【关键词】霍华德·雅各布森;《芬克勒问题》;犹太人的自我憎恨;偏见;反犹;身份认同

恨是人内在情感的一种表达,自我憎恨/自恨(self-hatred)从字面上看表达的是自己对自己的憎恨,但通过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可知,自我憎恨既是一种个体现象,也是一种群体现象,最典型的群体自我憎恨就是犹太人和黑人的自我憎恨。就“犹太人的自我憎恨”(Jewish Self-hatred)而言,不同的学者对其产生原因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这是犹太人固有的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有学者从语言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是不平等的文

* 饶雪,信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化交融的结果。^① 自恨以文学的话语表达出来,便形成了自恨文学。关于犹太人的自恨文学,李俊宇认为“耶利米哀歌”就是一个典型,而当代较具代表性的犹太自恨文学就是美国犹太裔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自恨”叙事。^②

被冠以“英国的菲利普·罗斯”之称的英国犹太裔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2010年凭借《芬克勒问题》(*The Finkler Question*)获得布克奖。雅各布森以三个男性主人公芬克勒、特雷斯洛夫、利博尔的爱情、工作、友谊为叙事主线,在戏谑而严肃的争论中探讨了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犹太身份等问题。在小说中雅各布森塑造了“羞愧的犹太人”(ASHamed Jews)这一特殊群体,实际上该群体与“自我憎恨的犹太人”(self-hatred Jews)在产生原因上有相同之处,是“自我憎恨的犹太人”的一种表现形式。学界对《芬克勒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叙事分析。学者大多认为雅各布森采用了喜剧的创作手法,但在雅各布森的喜剧中又包含着悲剧的因素,达到了寓庄于谐、严肃而搞笑的艺术效果。^③ 二是对犹太文化身份问题的探讨。学者多选取一个特定的语境来进行分析,如阿克塞尔·斯特尔(Axel Stähler)从当代英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复杂态度出发,探讨以色列对英国犹太人身份建构的影响^④,而吴攸则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多元文化交融与碰撞这一角度,分析了《芬克勒问题》中流散的英国犹太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⑤。本文借助社会心理学家对“自我憎恨的犹太人”的分析,考察“羞愧的犹太人”在巴以冲突背景之下为什么会对自身的犹太身份感到羞愧。通过层出不穷的反犹事件,雅各布森思考了对以色列的恨是

^① 关于“犹太人的自我憎恨”产生原因的不同观点,可参见李俊宇 Li Junyu,〈自恨现象研究——以犹太人和黑人为中心的考察〉[Self-Hate Phenomenon],于《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aqiao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2021年第6期[2021, Issue 6],5—15。

^② 参见李俊宇 Li Junyu,〈菲利普·罗斯的“自恨”叙事——以《波特诺伊的怨诉》为例〉[Philip Roth's Self-Hate Narrative: A Case of Portnoy's Complaint],于《国外文学》[Foreign Literatures],2021年第4期[2021, Issue 4],123—133。

^③ Christoph Houswitschka, “‘Show Me a Novel That's Not Comic...’: Howard Jacobson's *The Finkler Questio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442 (2019); 韩江红 Han Jianghong,〈寓庄于谐 寓悲于乐——《芬克勒问题》喜剧艺术及主题解读〉[A Tragicomedy Integrating Solemnity and Humor—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nkler Question*],于《山东外语教学》[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2011年第1期[2011, Issue 1],84—88。

^④ Axel Stähler, “Antisemitism and Israel in British Jewish Fiction: Perspectives on Clive Sinclair's *Blood Libels* (1985) and Howard Jacobson's *The Finkler Question* (2010)”, *Jewish Culture and History* 14 (2013): 2-3, 112-125.

^⑤ 吴攸 Wu You,〈文化交融还是文明冲突?——论《芬克勒问题》中的犹太文化身份困境〉[The Crossing of Cultures vis-à-vi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On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in *The Finkler Question*],于《当代外国文学》[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2019年第2期[2019, Issue 2],54—6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否会导致对犹太人的恨这一问题,揭示了非犹太人对犹太人难以改变的偏见。通过“羞愧的犹太人”组织成员芬克勒思想的前后变化,雅各布森批判了“羞愧的犹太人”具有反犹太主义性质的行为,展现了流散犹太人构建文化身份的困境,表达了他对犹太人未来的担忧以及对犹太身份的坚守。

一、巴以冲突背景下“羞愧的犹太人”:偏见的内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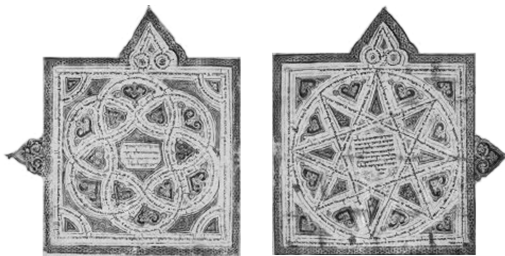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学界公认“犹太人的自我憎恨”这一术语出自1930年特奥多尔·莱辛(Theodor Lessing)创作的《犹太人的自我憎恨》(*Jewish Self-Hatred*)一书,克劳斯·P. 费舍尔(Klaus P. Fischer)评论称:“这是一本自我诊断和描绘犹太人受虐狂的古怪图书。”^①事实上,在莱辛明确提出这一术语之前,“犹太人的自我憎恨”现象就已经存在于犹太群体之中。桑德·吉尔曼(Sander L. Gilman)认为“犹太人的自我憎恨”是犹太人历史上存在的一种特定的自我否定(self-abnegation)模式的标签。作为一个标签,它有特定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语境。吉尔曼强调它的概念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中理解,在不同的语境中这个概念会以不同的修辞呈现出来,但是这个概念的内在结构是不变的。^②例如,中世纪犹太人以改宗的方式表达自我憎恨,19世纪犹太启蒙思想家以“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表达憎恨,大屠杀之后犹太人的自我憎恨以作家的形象呈现出来,但在不断变化的表现形式之下是自我憎恨不变的内在结构,“自我憎恨的中心范式只是刻板印象本身性质的复制品。在对感知变化的动态反映中,它是一系列不断波动的自我形象”^③,即“犹太人的自我憎恨”本质上是犹太人内化了非犹太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的结果。吉尔曼从语言文化角度追溯了“犹太人的自我憎恨”的发展史,在其研究的结尾,他提到了以色列建国之后出现的新形式的“犹太人的自我憎恨”,即部分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存在的恶意反对^④,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形式的自我憎恨只是处于萌芽阶段,吉尔曼也并没有进行详尽的阐释。然而,随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的不断加深,以色列的形象深刻影响着流散犹太人的身份建构,而部分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憎恨也越来越凸显,对以色列的憎恨

^① Klaus P. Fischer 克劳斯·P. 费舍尔,《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The History of an Obsession: German Judeophobia and the Holocaust], 余江涛 She Jiangtao 译(南京[Nanjing]:译林出版社[Yilin Press],2017),183。

^② Sander L. Gilman, *Jewish Self-Hatre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 1-2.

^③ 同上,12。

^④ 同上,391。



是新时代“犹太人的自我憎恨”的主要表现形式。

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认为:“自我憎恨指一个人为自己有着所属群体中为人鄙夷的特质而感到耻辱——无论这些特质是真实存在还是无稽之谈。我们也将自我憎恨一词用于对自己所属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的憎恶,因为他们‘拥有’这些特质。”^①吉尔曼认为:“自我憎恨产生于外来者(outsider)接受他们的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对他们的幻想,并将这些幻想看作真实的。”^②保罗·门德斯-弗洛尔(Paul R. Mendes-Flohr)强调自我憎恨的现象必须在同化的语境中理解。^③不难看出,自我憎恨是主体在以他者的标准对自己或自己所属群体进行审视之后的反应,其本质是内化他者的观念以求获得他者的认可。正如门德斯-弗洛尔所说:“自我憎恨是犹太人或者所有少数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付出的更为阴险的代价之一。”^④其后果就是“自我憎恨的犹太人”丧失对自身进行定义的权利,成了为不断获取参照群体认可而进行改变的变色龙。

关于历史上出现的“犹太人的自我憎恨”现象,李俊宇总结道:“犹太人的自恨繁盛于启蒙运动中后期的欧洲,那时候大量的德国犹太人受启蒙运动的影响,纷纷抛弃犹太教,要么加入基督教,要么全身心拥抱德国文化,或二者皆为。在二战前后的美国,犹太人中也会出现自恨高潮,而其诱因主要是融入和同化于美国社会的压力。”^⑤雅各布森在《芬克勒问题》中塑造的“羞愧的犹太人”可以说体现了“犹太人的自我憎恨”的第三次高潮,其主要表现为对以色列存在的憎恨,而其诱因也主要出于融入主流文化群体、获得身份认可的需求。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到1983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前后爆发五次中东战争,战争导致无尽的伤亡与苦难,尤其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以色列侵占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的领土,导致生活在其上的阿拉伯人无家可归,造成影响巨大的难民危机,对阿拉伯无辜平民的伤害使以色列的战争染上非人道的色彩,受到国际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在循环往复的战火与伤亡中,巴以双方领导人也致力于寻找和平之路,但在争取和平的道路上仍冲突不断。2008年,为了报复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对以色列的攻击,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了“铸

^① Gordon W. Allport 戈登·奥尔波特,《偏见的本质》[The Nature of Prejudice],凌晨 Ling Chen 译(北京[Beijing]:九州出版社[Jiuzhou Press],2020),164。

^② Sander L. Gilman, *Jewish Self-Hatred*, 2.

^③ Paul R. Mendes-Flohr, “The Throes of Assimilation: Self-Hatred and the Jewish Revolutionary,” *European Judaism: A Journal for the New Europe* 12 (Spring, 1978): 34.

^④ 同上,39。

^⑤ 李俊宇,《菲利普·罗斯的“自恨”叙事——以《波特诺伊的怨诉》为例》,12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铅行动”(Operation Cast Lead),该行动在阿拉伯世界又被称为“加沙大屠杀”(Gaza Massacre)。以色列通过军事打击摧毁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武装力量、军火武器以及军事设施,使加沙地区像铸了铅一样无法承载哈马斯的反以行动。“铸铅行动”总共造成至少 1300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约 5500 人受伤,其中一半为平民。^①

以色列因给阿拉伯民众造成的灾难长期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英国社会也存在这样的反以声音。在追溯英国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时,安东尼·朱利斯(Anthony Julius)将以色列自 1967 年六日战争以来在其存在的合法性上遭受的挑战称作“当代反犹太复国主义”(contemporary anti-Zionism),他认为在当代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中,可能会发现世俗的、左派的或后左派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新反犹太复国主义”),以及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教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统称为“教义反犹太复国主义”)。^② 英国在犹太复国主义道路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伴随犹太复国主义进程的便是不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激进主义在英国尤其强烈,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反以色列游说,而其重要的表现形式则是对以色列的抵制运动。^③ 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针对以色列的各种抵制运动在英国社会轮流上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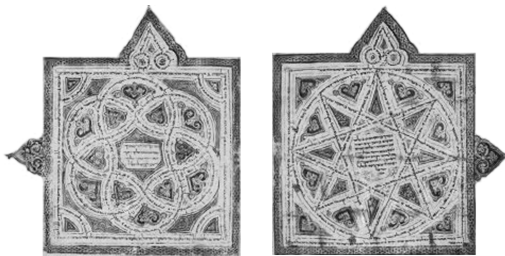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正是在这样一种大的政治背景之下,雅各布森创作了《芬克勒问题》。在小说中雅各布森塑造的“羞愧的犹太人”这一群体,是现实中英国社会中反以色列的犹太人代表,是“自我憎恨的犹太人”。他们以人道的名义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非人类的行为,对犹太复国主义行为感到不耻。“羞愧的犹太人”在对其他犹太人感到憎恨的同时,还包含着一种自我炫耀,他们向英国人展示自己的正义,以表明自己区别于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获取英国人对他们的认可。

小说中的“羞愧的犹太人”组织主要由英国犹太知识分子构成,包括学术教授、戏剧演员、著名厨师、脱口秀演员等。“羞愧的犹太人”这一名称来自小说中的犹太实用主义哲学家芬克勒,他同时也是一位电视名人,在电视节目中芬克勒公开表示自己为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园感到羞愧。戏剧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为褒扬芬克勒的勇气,决定将他们的团体命名为“羞愧的犹太人”。这些成员经常聚集在一起,以犹太人的身份对以色列感到羞愧。他们强调他们根本不憎恨自

^① 参见张倩红 Zhang Qianhong,《以色列史》[The History of Israel](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4),477—478。

^② Anthony Julius, *Trials of the Diaspora: A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i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442.

^③ 同上,443。



己的犹太属性,认为是他们在延续公正与同情等伟大的犹太传统。^①然而,实质上,犹太身份只是他们用来向英国主体证明他们区别于其他非“羞愧的犹太人”的工具,炫耀作为犹太人只有他们是正义的,他们并不真正认可犹太身份所象征的文化意义。

“羞愧的犹太人”的自我憎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反犹太复国主义,二是反犹太教。他们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行为比作新的纳粹主义,批判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对以色列采取抵制行动。“羞愧的犹太人”组织的抵制行动主要是对以色列大学与机构进行学术与文化抵制,当然还有其他形式的抵制。“羞愧的犹太人”组织团体中最重要的抵制者是默顿·库格尔,他在私人场所抵制以色列,不惜累垮自己的身体,也要抵制以色列的每一件商品。而“羞愧的犹太人”组织的首创成员阿尔文·伯利亚科夫每天坐在摄像机前记录自己的包皮修复过程,然后在互联网上发表反犹太教的长篇大论。他认为犹太教的割礼是对犹太人身体的一种残害,他要为全世界几百万身体受到残害的犹太人说话。“在阿尔文·伯利亚科夫看来,犹太人的割礼仪式和复国主义者的屠杀之间,必然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无助的犹太婴儿和赤手空拳的巴勒斯坦人是一样的,因为犹太人无所顾忌地饮着他们无辜的血。”^②反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太教在嗜血这一点上达到了一致,“羞愧的犹太人”坚持犹太人要为无数反人性的罪行负责。

吉尔曼认为“犹太人的自我憎恨”是一个可以和“犹太反犹太教”(Jewish anti-Judaism)、“犹太反犹主义”(Jewish anti-Semitism)互换的术语。^③克里斯托夫·胡斯维奇卡(Christoph Houswitschka)也认为萨姆·芬克勒是“羞愧的犹太人”的一员,他们是接近反犹太主义和自我憎恨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④如前文所述,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文化交融中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形式的自我憎恨,他们本质上是内化了流散地主体民族对犹太人的偏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羞愧的犹太人”的产生可以解释为他们面对文化压迫时所采取的一种防御机制,在巴以冲突的大背景下,他们内化了英国社会中存在的对以色列非正义的批判声音,内化了英国社会中存在的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站在了反犹太主义者的立场,以期获得他们的认可。“羞愧的犹太人”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文化交融

^① 参见 Howard Jacobson 霍华德·雅各布森,《芬克勒问题》[The Finkler Question],周小进 Zhou Xiaojin 译(上海[Shanghai]:上海译文出版社[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4),194。

^② 同上,307。

^③ Sander L. Gilman, *Jewish Self-Hatred*, 1.

^④ Christoph Houswitschka, “‘Show Me a Novel That’s Not Comic...’: Howard Jacobson’s *The Finkler Question*.”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过程中的受害者,他们丧失了对自身文化的自信,是徒有犹太身份的反犹主义者。

二、对以色列的恨与对犹太人的恨:难以改变的偏见

巴以冲突引起的问题,不仅影响犹太人对自身身份的定位,也牵动着世界各地对犹太人的认识。当“羞愧的犹太人”反犹太复国主义时,非犹太人的反犹行动也在同时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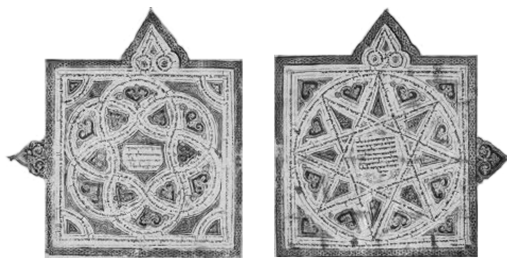
当回顾《芬克勒问题》的创作时,雅各布森谈到2008年至2009年以色列对加沙开展的“铸铅行动”对他的影响,他说:“那几个月的情绪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当时,我想记录下在这个国家(英国)做犹太人的感觉,当提出对以色列的憎恨是否会蔓延到对犹太人的憎恨(这种事情不是不可能的),以及一个新的水晶之夜是否即将到来等问题似乎是合理的时候。”^①他说《芬克勒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本关于犹太人身份的书。它讲述的是非犹太人想成为犹太人和犹太人不想成为犹太人的故事。以色列入侵加沙后,在英国有一种非常可怕的感觉——几乎是犹太人身份的危机,这本书因此获得了动力。我无法停止写这本书或思考这本书。考虑到以色列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从自己的角度写了一本小说,讲述在英国做一个犹太人的感觉”^②。

在小说中,雅各布森展现了大量的反犹主义事件,来凸显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行动给英国流散犹太人身份造成的危机,而这些事件都是现实生活中犹太人处境的一种反映。小说中的利博尔——特雷斯洛夫和芬克勒的老师,一个在大屠杀之前移民英国的捷克犹太人,收到一封半个多世纪未曾联系的一个女人艾米·奥本斯坦因的来信,询问他是否还在写专栏。艾米22岁的孙子被阿尔及利亚人刺中面部导致失明,凶手在攻击时用阿拉伯语喊“上帝伟大”,还有“所有犹太人去死”^③,事情发生在伦敦,在以色列入侵加沙之后。艾米的孙子受到的伤害其实就反映了对以色列的恨导致了对犹太人不加区分的恨,艾米的孙子并没有参加加沙行动,但作为一个犹太人在阿拉伯人眼中他就是有罪的,就应该为以色列的行为负责。而面对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报复,处于事件之外的旁观者中有一种声音称他们可以理解阿拉伯人的行为。艾米希望找利博尔这样的新闻界人士来发声,不仅要控告袭击者还要谴责那些声称理解这一袭击行为的人。

① Howard Jacobson, “Anti-Zionism-Facts (and Fictions),” *Jewish Chronicle* (July 30, 2010): 22.

② Simon Round, “Interview: Howard Jacobson,” *Jewish Chronicle Online* (January 21, 2010).

③ 霍华德·雅各布森,《芬克勒问题》,211。



艾米告诉利博尔,一个电影导演说他理解为什么有人要使她的孙子失明,理解为什么人们恨犹太人,想杀死他们。艾米对这个电影导演的评论充满愤怒,对他表示理解的言论不满。因为在艾米看来,“理解”包含了某种正当性,为那些袭击她孙子的人提供正当性。艾米质问道:“因为加沙,所以就可以把我孙子的眼睛弄瞎?难道一切以加沙名义犯下的罪行,因为加沙就提前宽恕了?”^①艾米所提出的问题其实是,是否因为以色列给加沙造成了伤害,一切以加沙为名义对犹太人的伤害就是正当的,是否为了表达仇恨阿拉伯人就可以对犹太人采取任何行动,而犹太人只能默默忍受。小说中电影导演的观点,其实就代表了现实中部分文化人士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对犹太人所采取的态度,他们不区分流散与非流散犹太人或者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作为整体的犹太人,而没有作为个体的犹太人,作为个体的犹太人的人性被抹除。因此,当单个的无辜犹太人受到伤害时,他们也不会出于人道的名义为犹太人辩护,这样就使犹太人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像利博尔这样的流散犹太人,面对这一人性抹除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也在被抹除之列。

在对袭击行为表示理解之外,更多的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伴随巴以冲突在英国以及世界各地上演,不仅包括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报复,也包含反犹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攻击,还有普遍存在的对犹太人难以改变的刻板印象及偏见。小说叙述道,在利博尔表示无法帮助艾米之后,艾米经常打电话给他,向他讲述发生的反犹事件,例如两个戴流苏披肩的犹太男孩又被袭击,伦敦北部一个犹太公墓里的墓碑被人损坏等。而利博尔自己也回想起他和妻子玛尔琪住在威尔斯登(Willsden)时遭遇的黑暗时期,他们因将一栋公寓用作出租屋,变成了房东,而遭受租户的谩骂指责,说他们是“只知道搜刮钱财的脏犹太人”^②,而那些指责他们的人不过是英国的普通民众,吝啬、肮脏是他们对犹太人的一种刻板印象。

利博尔的曾侄孙女赫夫齐芭,想在伦敦兴建一个盎格鲁-犹太文化博物馆,展示犹太人在英国的成就以区别于普遍存在的大屠杀纪念馆,但她的犹太文化博物馆也遭到反犹袭击,刚安装好的橡木门把手上被反犹分子挂上咸猪肉,而且他们在墙上写“所有犹太人去死”^③。报纸上充斥着反犹的言论,以色列士兵杀害巴勒斯坦人被解读为就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贩卖人体器官。华盛顿一家犹太博物馆的一名保安遭到枪击,负责犹太公共设施的人都感到震惊,焦虑恐惧在犹太人之间传播。电影院里关于犹太人杀死巴勒斯坦人的电影在上演,犹太人被比

① 霍华德·雅各布森,《芬克勒问题》,213。

② 同上,291。

③ 同上,314。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作纳粹,被看成谋杀儿童者。中世纪关于犹太人嗜血杀婴的诽谤标签在 21 世纪又重新被贴在犹太人身上。“犹太人又成了问题。罕见地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反犹主义又恢复了它长期以来的面目——一台永不停歇的自动扶梯,任何人只要愿意随时可以跳上去。”^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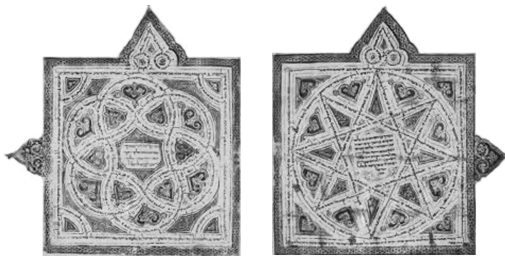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1967 年六日战争,以色列占领加沙及约旦河西岸的领土,在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定居点。因为定居点的问题,以色列在数十年间遭受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袭击。2003 年,在巴以寻求和平的道路上,以色列总理沙龙提出“脱离计划”,即撤离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与巴勒斯坦脱离。然而,在撤离的行动中,部分犹太定居者不愿离开定居点,抗议与袭击时有发生。在小说中,雅各布森讲述了撤离背景下发生的悲剧。迈尔·阿布拉姆斯基是定居点的定居者,坚信定居点就是他们的土地,是上帝应允给犹太人的圣地,坚决不愿离开定居点。面对撤离的命令,他没有袭击前来驱赶的以色列士兵,而是爬上一辆公交车,打死了一家阿拉伯人。面对这一事件,赫夫齐芭及其他犹太人都感到震惊,为这一悲剧感到震惊,同时也为他们即将不得不面对的后果震惊,因为“到处都把犹太人描述成嗜血的怪物,无论复国主义的历史如何解释——是从他们攫取他人国家一开始就嗜血,还是事件逐步累积使他们失去了同情心而变得嗜血——可是没有任何犹太人在为这个阿拉伯家庭的死亡而欢呼,街道上没有,他们自己家里也没有……汝等不可杀人!那些诽谤者、那些煽动仇恨者,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往犹太人身上泼脏水,说他们是种族主义者、犹太至上主义者,但汝等不可杀人已经烙在犹太人的心中”^②。

像赫夫齐芭这样的犹太人并不觉得占领区的定居者与她们有任何相同之处,她也不同意这些定居者的行为,认为其是普遍非理性的孩子,但是伦敦街头的那些反犹主义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不会区分到底有哪几种犹太人,在他们心中,只有一种犹太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在探讨偏见的本质时认为,偏见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喜爱或者厌恶的态度,另一个是过度泛化的信念。他认为如果没有针对整个群体的泛化信念,敌对态度就无法长久地持续下去。且人们的信念系统有一套自我调整的把戏,去配合和维持更永久性的偏见态度。^③ 反犹主义就是一种针对整个犹太人群体的泛化信念,所以当一个人犹太人犯罪时,整个犹太群体都会被视为有罪的,即使在与个体的犹太人相处时反犹主义者发现这个犹太人并不是有罪的,他也会作出自我调整,来合理化他的敌

① 霍华德·雅各布森,《芬克勒问题》,315。

② 同上,387。

③ 参见戈登·奥尔波特,《偏见的本质》,14—15。



对态度。

在巴以冲突的背景下,不管是对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行为的理解,还是对犹太人肮脏、吝啬、嗜血杀婴的诽谤,都是长久以来非犹太人对犹太人偏见的一种投射,犹太人在非犹太人的心中作为一种标签符号是一个整体,不管犹太人对以色列的行为是否感到羞愧,不管犹太人是否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在对犹太人持有偏见的非犹太人眼中,他们都是同质的。雅各布森通过众多发生在英国的反犹事件,揭示了潜藏在英国主流群体中的难以改变的对犹太人的偏见。

三、反犹现实下对“自我羞愧”的重思:芬克勒的身份转变

如前文所述,在反犹主义者眼中只有作为整体的犹太人,所以当反犹主义者攻击犹太人时,不管“羞愧的犹太人”有多么反对以色列,认同参照群体的价值观,他们在参照群体看来也始终是局外人、他者。正如吉尔曼所说,在“自我憎恨的犹太人”接受参照群体对他们的定义时,这种接受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对立,一方面是外来群体幻想只要他们遵守参照群体的要求,他们就能获得认可。另一方面是参照群体隐藏的资格与诅咒:你越像我,我就越知道你希望分享的我的权利的真正价值;你越希望分享,我也越意识到你只是一个伪劣的冒牌货,一个局外人。^① 所以,“羞愧的犹太人”在本质上处在一种不平等的文化交融之中,无法获得参照群体真正的认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不平等文化交融的深刻体悟中,作为“羞愧的犹太人”组织的一员,芬克勒发生重大的思想转变,退出“羞愧的犹太人”组织。《芬克勒问题》出版后并没有像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诉》那样引起犹太人强烈的反对与批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雅各布森不仅表达了犹太人中存在的自我憎恨心理,也表达了对自我憎恨的犹太人以及造成犹太人自我憎恨的压迫群体的批判。

在小说中,每当有自我憎恨的言论发出时,就有相应的反对自我憎恨的声音。当芬克勒还是“羞愧的犹太人”时,他的反对者主要是他的妻子以及利博尔等亲密的人。芬克勒的妻子泰勒,是一个想成为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当芬克勒在电视节目中公开表示自己的羞愧时,在家里观看节目的泰勒就会为芬克勒的行为感到羞愧。在泰勒的眼中,芬克勒就是一个虚荣、爱炫耀、自大、自夸、自傲的人,就是为了获得名誉而将羞愧当作工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利博尔也指责他不应该将自己对犹太人的羞愧当众展示,他和泰勒都认为这是犹太人自己的事情,不应该在非犹太人面前展示。奥尔波特观察道:“急切想要抹去弱势群体

^① Sander L. Gilman, *Jewish Self-Hatred*, 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对他们的影响并向往融入主流群体的人,往往会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敌视。他们会认为这样的人是‘自命不凡的’‘马屁精’,甚至是叛徒。”^①在泰勒以及利博尔等人眼中,芬克勒及其他“羞愧的犹太人”的行为就具有背叛的性质,泰勒评价芬克勒说:“他这种犹太人,要是换个时代,连最憎恨犹太人的国王或苏丹都会给他高官做。”^②

泰勒去世后,芬克勒会经常回想起泰勒对他的批评,并反思自己的行为,而他与“羞愧的犹太人”组织的意见分歧也逐渐使他认识到羞愧行为中的背叛性。面对“羞愧的犹太人”对以色列开展的学术抵制运动,芬克勒持反对意见,在潜移默化中他内化了泰勒和利博尔的观点,即作为犹太人,羞愧是犹太人自己的事,不应该公开展示,而作为一家人,犹太人更不应该抵制犹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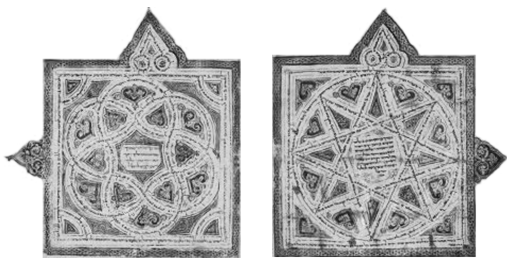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面对不断发生的反犹事件,利博尔表示让人感到难过的不仅仅是犹太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还有犹太人在反犹事件面前感觉的丧失。而芬克勒则表示丧失感觉是因为他们在如何应对反犹事件上彩排得太频繁,他认为是犹太人自己制造了一种无谓的焦虑气氛,芬克勒希望将犹太人遭遇的攻击看作正常普通的事件。但当芬克勒听到自己的儿子卷入了一场反犹袭击之后,他也感到恐惧害怕,感到焦虑。而经常幻想捶打父亲肚子的芬克勒,在梦中梦见自己的犹太父亲在自己的商店中被反犹主义者袭击。发生在亲人身上的或真实或虚幻的反犹事件,仿佛都是对他不严肃对待反犹事件的警告。通过芬克勒,雅各布森其实是对现实中众多持同样麻木冷漠态度的犹太人的质问,难道非要等到反犹事件切实地发生在自己身上,犹太人才采取行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吗?

在面对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以色列的反对时,芬克勒的立场也发生重大转变,在公开场合,他情不自禁要为以色列的存在进行辩护,虽然他仍对以色列杀害无辜阿拉伯人感到羞愧,但他并不像“羞愧的犹太人”组织成员那样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有罪的,要彻底反对以色列国的存在。在一场关于以色列建国的合法性的辩论中,一个非犹太女人说去到圣地她看到的是一个被种族至上主义者统治的种族隔离国家,作为一个犹太人芬克勒难以接受犹太人被看作种族至上主义者,本来在辩论中处于批判以色列立场的芬克勒从受伤的心里发出对非犹太女人的谴责:

你怎么这么大胆,一个非犹太人——你怎么这么大胆,竟然以为自己能告诉犹太人他们该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难道不正是你——一个欧洲非犹

① 戈登·奥尔波特,《偏见的本质》,165。

② 霍华德·雅各布森,《芬克勒问题》,163。



大人——让犹太人独立建国成为必要吗？

你用暴力把人从你的土地上赶走，现在他们不来烦你了，你居然认为自己有权高高在上，规定他们该到哪儿去、该怎么做才对他们有好处，这是什么扭曲、复杂的逻辑呢？我是英国人，我爱英国，你是不是也认为这不是种族歧视的国家？每个国家的近代历史都有污点，都有针对某种人的歧视和仇恨，哪个国家不是？我们本身就是种族主义者，又有什么权利去指摘别人身上的种族主义？只有在一个无需畏惧的世界里，犹太人才会应允接受人类的教训。否则，犹太人的国家给全世界的犹太人提供安全——没错，犹太人优先——可能并不公正，但绝不能说是种族主义。一个巴勒斯坦人可能会说，这让他觉得像是歧视，我理解他，尽管他们的历史上也鄙视过信仰不同的其他民族，但你呢，女士，我无法理解，你的表现像是心里在流血、良心受煎熬的非犹太世界的代表，而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要逃离的就是这个世界，这并不是他们的错……^①

芬克勒从历史现实以及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为以色列建国赋予合法性，芬克勒想表达真正造成犹太人采取复国行动的其实是欧洲那些种族论者，在欧洲犹太人是种族主义受害者，所以，作为迫害过犹太人的种族主义国家就没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行为。

在公开的辩护之后，芬克勒退出了“羞愧的犹太人”组织，不断发生的反犹事件使他认识到“羞愧的犹太人”并不能改变主流群体对他们是犹太人的认识，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犹太身份以及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职责。面对反犹现实，他意识到作为一个犹太人“最难的部分，是不要由敌人来定义自己”^②。小说结尾芬克勒完成了身份的转变，把名字从萨姆·芬克勒(Sam Finkler)改回了萨缪尔·芬克勒(Samuel Finkler)，萨缪尔是一个古希伯来先知的名字，在上大学之前他坚持叫自己萨缪尔，但后来改为萨姆，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名字的重拾意味着芬克勒重新做回了犹太人，意味着他对犹太身份的坚守，也意味着他要自己定义自己而不再以非犹太人的观念来定义自己。

然而除了改变自身之外，面对强烈的反犹现实以及犹太人面对反犹时习以为常、麻木、厌倦的态度，芬克勒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在犹太会堂里祈祷。小说结尾，利博尔因无法忍受失去妻子的痛苦，跳崖自尽，芬克勒每天去教堂为利博尔哀悼，但三十天哀悼时间完成之后，芬克勒并没有停止他的哀悼，谁也不能让他

^① 霍华德·雅各布森，《芬克勒问题》，325—326。

^② 同上，38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停下来,他几乎可以去哀悼所有犹太人,而且也不限于犹太人,芬克勒的悼念永无止境。

通过芬克勒的身份转变,雅各布森表达了在流散语境之下对犹太身份的坚守以及面对强大的反犹现实对犹太人未来的担忧,同时也表达了对反犹主义者的批判。雅各布森是当代英国较具代表性的犹太裔作家,敢于直面棘手的英国性问题^①,在表达犹太声音的同时,体现了当代英国犹太裔作家逐渐找回的自信态度^②。

结 语

“犹太人的自我憎恨”长期存在于流散犹太人的心里,深刻影响他们在文化交融中对自身身份的定位。作为“犹太人的自我憎恨”现象的延续,巴以冲突背景下的“羞愧的犹太人”也是不平等的文化交融的产物,他们为了寻求融入主流群体内化了参照群体对以色列及犹太复国主义的批判,而丧失了自身的犹太立场。而反犹的现实则揭示出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偏见难以改变,“羞愧的犹太人”最终不仅得不到主流群体对他们的接受,还使他们背上叛徒的骂名。通过《芬克勒问题》,雅各布森揭示了,只有保持文化自信,坚守自己的文化身份,自己定义自己,才不会沦为文化交融过程中的牺牲品。

① Bryan Cheyette, “Imagined Communities: Contemporary Jewish Writing in Great Britain,” in V. Liska and T. Nolden, eds., *Contemporary Jewish Writing in Europe: A Guid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97.

② Ruth Gilbert, “Contemporary British-Jewish Writing: From Apology to Attitude,” *Literature Compass* 5 (2008): 394-406.